



独行斋独语

袁良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独 行 斋 独 语

袁良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乃光

装帧设计：李士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行斋独语/袁良骏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8. 1

ISBN 7-5078-1503-X

I. 独… II. 袁…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1667 号

独行斋独语

袁良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272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ISBN 7-5078-1503-X/I·105 定价：16.50 元



袁良骏 先生像
(作者 许谋清)

代 前 言：

我的杂文观

袁良骏

鲁迅认为杂文应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应注重于对丑恶事物的斗争和挾发，我觉得这实在够得上是杂文最本质最经

典的定义，也是杂文生命力之所在。当然，鲁迅说得很清楚，杂文也要给人“愉快和休息”，斗争和挾发必须是艺术的、美的、耐人寻味的。

善于调理这两个方面，就产生了杂文的多种样式（杂感、随笔、小品乃至锦言絮语等）和多种风格（尖锐泼辣、幽默讽刺、含蓄蕴藉等），就有了杂文家驰骋的广阔天地，就有了杂文五光十色、摇曳多姿的大千世界。

“小摆设”也是需要的，鲁迅对此否定过多。当然，“小摆设”只能是“小摆设”，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杂文的主流。



袁良骏，字万里，笔名胡陵生，1936年9月12日生于山东鱼台。1956年毕业于山东菏泽一中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3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学研究所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该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代表性论著有《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1980)、《鲁迅研究史》上卷(1986)、《当代鲁迅研究史》(1991)、《丁玲研究五十年》(1990)、《白先勇论》(1991)、《白先勇小说艺术论》(1991)、《鲁迅杂文研究》(1996)、《香港小说史》(待出)等，尚有关于鲁迅、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总量约700万字。编选、辑佚类著作有《现代独幕剧选》(1978合作)、《丁玲研究资料》(1982)、《丁玲集外文选》(1983)、《川岛选集》(1984)、《丁西林独幕剧选》(1986)等。

目

录

- 1 代前言：我的杂文观
- 1 读《看镜有感》有感
- 4 难得的大家风度
- 6 长者的谦诚——关于茅盾先生的四封信
 附录：茅盾先生信四封
- 13 老舍与鲁迅
- 17 老舍与吴组缃
- 26 老舍书赠吴组缃长条
- 28 钱钟书的爱国情怀
- 30 “红黑社”三作家
- 33 沈从文先生的一篇佚文：《看了司徒乔的画》
- 38 语言学家的幽默与讽刺——读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 43 “失望”为时过早
- 45 天涯归客恋神州——记白先勇北京之游
- 52 初访金庸
- 54 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
- 61 周作人余谈
- 64 川岛先生谈“二周失和”
- 66 “秋海棠”辨
- 68 “二周”和京剧
- 71 鲁迅和梅兰芳

75	鲁迅并未如是说——致汪曾祺先生
78	丁、沈失和之我知我见
83	秉笔直书与随心所欲
89	报告文学的危机
92	报告小说——一个文学怪胎
94	“新补”质疑
96	寄语中华小说家
101	“知识跌价”与社会癌症
104	三“会”杂谈
106	说“一阔脸就变”
108	“打官腔”
110	“乡民”与“文豪”
112	反腐倡廉的轻骑兵——韩英小品文撷英
115	“娘打孩子”与“三岔口”
119	“才”论
123	两唐书缘何贬损李商隐？
127	“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
	附录：郭亚南《“知识”加“能力”才是力量》
130	想起了鲁迅的《奇怪》
132	“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
140	不必曲为孔子辩
	附录：李燕《孔子不骂女子》
143	孔子、“女子”和《论语》
145	沉滓的新泛起——“巫婆”、“神汉”及其他
148	“虚假广告”也应绳之以法
150	“感性”和“理性”
152	论“走穴”
155	明星“退化症”
157	闲话“追星族”
160	也谈“大师”
162	版坛三户

164	“误排”、“误删”之类
166	是“语言大典”还是“笑话大全”
169	说“色狼”
171	别忘了“约定俗成”
173	沈老何曾写《春桃》?
175	也谈杂文的属性
178	把鲁迅杂文交给青年
181	“好人”和“巫婆”——读书杂谈之一
184	“落地的人头称赞好快刀”——读书杂谈之二
186	精读、略读并行不悖——读书杂谈之三
188	万书皆备于我——读书杂谈之四
191	不宜笼统提倡“快速阅读法”——读书杂谈之五
193	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杂谈之六
	附录:吴向《书不可多读》
196	要客观地评价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请教
199	“不读书好求甚解”又一事
	附录:梁秉堃《不读书而求甚解》
201	“鲁迅研究书系”序
203	从“鲁研书系”说到鲁迅读书
205	《亲爱的丈夫》前记
207	马华诗坛有知音——序吴天才君《鲁迅赞》
210	《鲁海拾零》序
212	《丁玲集外文选》编后记
214	《川岛选集》编选赘语
219	《香港大学生》与《围城》
227	现实主义并未死亡——兼谈《酒徒》
235	陶然新作与“廊桥遗梦”
238	《天谴》的艺术张力
242	读《九龙城寨烟云》
246	鹰之歌——读黄国彬散文一得
250	“人生边上”的“补白”

255	画魂·民魂·国魂——读赵淑侠《赛纳河之王》
261	崇高人性美的赞歌——读隐地“人性三书”
270	里程碑与休止符——杂谈闽版《台湾文学史》
274	《香港文学史》得失谈
278	华文文学的“三多”（多元化，多方位，多中心）
281	“中举”之前
285	岭南三月
300	北京气象 ABC
303	敦煌的自然魅力
307	馆前遐思
311	问路
313	丁玲印象记
324	他不该死——悼唐弢同志
326	我的学术引路人——纪念王瑶先生
331	昊天不吊薛绥之同志
334	悼念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
337	杂文有望
339	跋

读《看镜有感》有感

《看镜有感》是鲁迅先生五十三年前（一九二五年）写的一篇杂文。

“看镜”何以“有感”？原来鲁迅看的并不是今天常用的玻璃镜，而是一面汉代的古镜，被古董店家称为“海马葡萄镜”的。鲁迅看的这一面虽无“海马”（即“洋马”），却有“葡萄”，镜上的装饰全取大宛、安息等西域诸国的物事，颇为新颖、生动。看着这面汉代的古镜，面对当时军阀混战、腐败污浊的现实，鲁迅先生感慨地想到了汉代以来的我们的那些祖先，想到了他们对外国新鲜事物迥然不同的态度。

他首先想到的是汉代祖先的“闳放”：从外国“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至唐，不仅人们墓前的石兽多为洋种（如羊、天禄、辟邪等），就连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上，也“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宋代以后，日渐走了下坡路。汉、唐祖先的“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而那些束缚人们手脚的“繁文缛节”和“唠叨的碎话”却盛行起来。表现在文艺上，腐败保守的“国粹气味”熏人，再也不敢像汉、唐祖先那样大胆学习和吸收外国的新鲜事物了。直到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成了全国统治者的清朝初年，才稍稍表现了一点汉、唐的遗风。但曾几何时，“国粹气味”就甚嚣尘上，一些诸如“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似的

“国粹”派日渐多起来。发展到清末，“国粹”家竟连新传入国内的玻璃镜也加以反对，说什么“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云云，简直荒唐透顶而又滑稽可笑了。

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递宋以降，国势江河日下，一再对外敌称臣，甚至有的汉族统治者竟甘心情愿充当外族侵略者的“儿皇帝”。到了清朝末年，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中国比起西方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几乎落后一个世纪。难怪鲁迅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由国家的盛衰兴亡，鲁迅又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吃东西。只要是食物，那些身体健壮者便往往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抓起来便吃；惟有那些身体衰弱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结果，这类人物却总归是日渐衰弱，“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读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今天我们对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入。究竟我们是学习汉唐的“豁达阔大”，还是学习宋人的“神经过敏”？究竟我们是作一个壮健的食者，大量吸收，为我所用，还是像那些“战战兢兢”的病号一般，吃这个怕“害胃”，吃那个怕“伤身”，“许多禁条，许多避忌”？我想，答案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尽管我们是汉、唐祖先的后代，但骨

子里也早已掺入了宋代以来的“孱王和孱奴”的血液。虽然我们先进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但我们毕竟又是夜郎自大的故乡！正像“豁达阔大”曾经是我们的光采一样，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也始终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不散的阴魂。对于学习、吸收外国的一切先进事物，有些被“阴魂”附体的人便难免呈现“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的狼狈相。不过它的表现形态可能倒是振振有词的大道理，诸如“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拜倒西方”之类。在这些人看来，“自力更生”就是与世隔绝；“艰苦奋斗”就是一颛一颛；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就破坏了我们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于是，与其这样，倒不如慢悠悠的老牛破车更其心安理得了。

幸亏，这种冒牌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日渐其少，他们那“空洞的高谈”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以至被广大人民视为“毒害革命的甜药”了！的确，既然自己的科学技术由于多年的干扰破坏已经严重落后，那么，为什么不应当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呢？让我们放开眼光，阔大气魄，将那些别人所有而我们所无的先进东西尽数“拿来”吧！正像吃了牛羊肉我们不会就变成牛羊一样，学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也绝不会就变成资本主义的。否则，“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还有什么四个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前途又何堪设想？！

原刊 1978. 10. 8 人民日报。

难得的大家风度

1926年顷，鲁迅已经成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他的名作《阿Q正传》等已先后译成了日、俄、法等国文字。这时，鲁迅的学生、朋友、青年小说家台静农编辑了我国第一本研究鲁迅的论文集，题名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除收入周作人、沈雁冰等评论鲁迅、访问鲁迅的十二篇文字外，还收入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赞语以及俄、日、美一些作者论及鲁迅的有关文字。书编成后，台静农特请鲁迅过目、指正。鲁迅提了这样三条意见：一、删去周作人的《阿Q正传》评论；二、删去所有外国人的文字；三、添上陈源的《致志摩》。

出于对鲁迅的敬意，台一一照办了。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有一两篇文字，在我个人是觉得并非无意义的；还有国外的人，如法国罗曼罗兰对于法文译本《阿Q正传》的评语，和这一篇的俄文译者俄国王希礼君致曹靖华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那的新人及黎明运动》中关于他的记载，以及最近美国巴特勒特去访问他的时候的重要的谈话，本来都拟加入，后来却依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意见，一概中止了，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陈源教授的信。”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外国人的文字，都是赞扬鲁迅的小说创作的；而陈源教授的《致志摩》却是对鲁迅大搞人身攻击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某些奴性十足的人们，往往

以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鲁迅偏偏要把外国人的赞词删去，恐怕是针对了这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的。鲁迅并非不感激那些对他的创作提出了中肯批评的外国朋友，但基于当时不幸的社会现实，他宁肯将这些可贵的意见统统删去。

至于劝编者将《致志摩》收入，则尤为表现了鲁迅的大家风度。陈源的这封信，发表于1926年元月30日的《晨报副刊》，而台静农的《序言》则写于6月20日，相距仅有数月。即使不管内容和文风，仅仅从时限考虑，台也完全有理由将这封信排除在編集范围之外。但鲁迅却执意编入，这就说明他是有意要容纳正确、错误、攻击等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不愿仅仅听到肯定和颂歌。后来，这变成了鲁迅的一种突出风格，在一些论战文字中，他有意要尽量收录论敌的文章，而不是一见否定、攻击便火冒三丈。

俗话说：泰山不拒土壤，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拒细流，方能就其深。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伟大人物都是有这种吐纳宇宙的大家风度的。这一点，似乎很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某些少年得志的青年作家戒。即使鲁迅主张删掉他弟弟周作人肯定《阿Q正传》的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种一般人不易做到的大家风度呢？

原刊1985.12.25人民日报。

长者的谦诚

——关于茅盾先生的四封信

大约在“四人帮”粉碎一年之后，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期的《世界文学》上，我读到了茅盾先生的《向鲁迅学习》一文，受到很大教益。有鉴于“四人帮”对鲁迅的神化、篡改和利用，茅盾在文中是有意将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伟人、一个文学家来对待的。但由于茅盾先生当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而且“左目失明，右目亦仅零点三视力”，无法翻阅更多的原始材料，故而文中的一两个地方提法欠周。于是，在拜读了茅盾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我便贸然给他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文章提出了两点小小的意见，供他参考。但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给我写来了一封态度十分谦虚、诚恳的回信。面对茅盾先生这种谦诚的态度，我简直怀疑起自己来：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是否太主观甚至太狂妄了！

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果茅盾先生哪怕有些微的“学阀气”，他完全可以对我这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置之不理，甚至可以非常容易地给我戴上一顶“不读书好求甚解”的帽子。然而茅盾先生却全然不是这样。他不仅亲笔给我回了信，而且使用了令我十分不安的

“极为感佩”、“俱见精审”等字样。这些话虽然可以理解为长者对晚辈的一种奖掖之辞，但它毕竟使我感到受之有愧而不胜惶恐。谁知茅盾先生还建议我将自己信中的“论点写成一文寄给世界文学，以正视听”，这就更使我无地自容了！我的那点一孔之见，哪里有什么写成文章的价值？如果这样一点浅见也可以敷衍成篇，世界上的文章岂不要泛滥成灾了吗？

二

收到茅盾先生回信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恢复了现代文学教研室和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为了进一步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的流毒，我们现代文学教研室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两校同行，预备举行三次学术讨论会：①“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功过；②“左联”评价；③“两个口号”论争。收到茅公回信时，前两次已经由两个兄弟院校主持开过，而第三次则由北大筹备，在北大召开。作为这次会议的筹备者之一，我又给茅公写去了一封信，希望他作为文学前辈和三十年代当事人光临这次讨论会。茅公回信谢绝了。但在回信中却委婉表述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仍不失为重要的一家之言。

平心而论，“两个口号”之争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它充其量不过是三十年代“左联”内部的一次意见分歧。其所以闹得越来越大，关键是被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极“左”路线利用了，周扬等人如果没有宗派主义，就不必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视作洪水猛兽，也就不必授意徐懋庸写信给鲁迅大加指责，更不必发动对鲁迅及其所提口号的大肆围攻，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与鲁迅商量到底提什么样的口号更好。但是，随着鲁迅的去世和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早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江青之